

关于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之余论

尹韵公

摘要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采访西北。范长江自己后来说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范长江“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记者”。事实上,范长江西北行时正处于思想立场的剧烈转型期,尚未最后定型,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自1934年7月起先后有5路红军长征,它们长征的起点不同、过程不同、到达陕北的时间不同,因此范长江西北行的目的不可能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范长江在西北行中基本没有接触到红军,他对红军的报道并不完全真实。1935年7月才赴西北采访的范长江也不可能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现有史料证明,陈云才是正面报道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在塞上行中,见到了一批我党高层人士,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使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自此才彻底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另一新闻巨子邹韬奋与范长江的思想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对范长江早期思想的研究中,要敢于正视和承认范长江西北采访前后存在着思想弱点,不应为尊者隐、为尊者讳,实事求是研究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 范长江 红军 长征 陈云 邹韬奋 新闻报道 历史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19.29 K82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0)04-0110-07

作者简介 尹韵公,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26)。

5月10日,信手打开香港凤凰电视台属下的凤凰网,看到网上正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题为:“你是研究人员,发现英雄伟人的负面史料,你会如何处理?”下面有4个选择:(1)为尊者讳,把史料处理掉;(2)作为学术成果在小圈子发表;(3)公众有知情权,应该大范围公布;(4)不知道。投票结果分别为:238票(占3.9%)、1277票(占20.8%)、4532票(占73.6%)、107票(占1.7%)。

第3个选择获得大多数参与者支持,说明人们对掩饰、掩盖一些英雄伟人之类正面人物的负面或不利资料,是不赞成和相当反感的。这也同时说明,大多数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期待是非常理性的,而对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强烈不满的。由此联系到我对范长江

与《中国的西北角》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是非对错争论,于我则是不由得信心更强、劲头更足。于是,提起笔来,抖擞精神,将去年发表的论文《论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之不能成立》^①中尚未写尽的意思,一一道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和大方之家。还是那句老话:学术争鸣,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服从真理。

我曾经说过:范长江说的“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这句话,表述不清晰,因为先后有5路红军北上长征。那么,这5路红军是指哪几路红军呢?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叙述如下。

^①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一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934年7月初决定由方志敏、寻淮洲、粟裕等人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其真正目的在于吸引和转移敌人注意力,以减轻国民党正规军对我中央苏区日趋严重的压力。很不幸,这支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几近歼灭性的打击。

二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934年7月下旬电令由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离开浙赣革命根据地,到湖南中部发展。其真正目的还是企图吸引敌人一部分军力,以缓解敌军对中央苏区的严重压力。8月7日,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由此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10月26日,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四川酉阳举行会师大会。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进攻。

三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近9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向西实施战略转移。此刻,中央红军尚不知“长征”究竟是什么滋味,因为他们完全不清楚、事实上也不知道战略转移何时完成、花多长时间、落脚何处等等。一切都没有事先谋定,一切都依具体情况而行。

四是,1935年4月10日,张国焘等人率领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南方向长征转移。6月12日,北上的中央红军与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两军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五是,徐海东等人率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7月15日从陕西长安县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同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师,历经一年时间,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共1.7万人于1935年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正式开始长征。1936年6月底、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省甘孜地区。

随后,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甘宁,红四方面军先南下又北上的长征历时一年多而胜利结束;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从以上可以看出,5路红军长征起点不同,时间不同,过程也不同,前后耗费两年多时间。

现在,当我们将范长江的说法,同以上5路红军长征的路线和时间相对照,便会发现,范长江的说法确实太模糊不清了,指向太不明确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研究5路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吧?更遑论中央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的时间相差整整一年之久!

还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虽然后来多路红军长征后期走的是北上路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多路红军长征的前期和中期却一直是往西转移,当时叫做“西征”。例如,中共领导人之一陈云以“史平”化名,发表在1936年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最早在共产国际范围内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就叫《英勇的西征》。^①据有人统计,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先后8次选择落脚点,前7次均未成功,只有最后一次才正确地选择了陕北。这就从又一个侧面证明,范长江说他“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说法,与当时红军长征的路线及其时间表,是无法对上卯的。

二

谁是最早正面报道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给了我们坚实而有力的回答:有!他就是陈云!上文已提到过,下面我们有必要展开论述。

红军长征初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兼任中央红军五军团中央代表。遵义会议后,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①这样,陈云便悄悄地离开了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化装成商人,辗转赴上海,执行中央交代的新任务。

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白色恐怖很严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出于安全考虑,要陈云和“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②8月下旬,在中央特科的安排下,陈云等人登上一艘苏联轮船,由上海前往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正是在这危险而紧张的一个多月中,陈云抓紧时间,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1936年3月,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上。该文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真实、生动、细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西征,行至四川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历程。^③

《随军西行见闻录》长达近3万字。文章如实描写了中国现状:“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肖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文章还如实描写了红军状况:“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士兵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文章还直接赞赏“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文章还称赞了红军上层干部群体:“赤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陈毅、罗炳辉、赵博生、董振堂等高级军官,“富有作战指挥能力”。“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步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

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才,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当年7月,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具有权威性的《陈云年谱》指出:这个单行本“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袖的书籍,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④同样具有权威性的《陈云传》写道:“陈云这本书,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读过这本书,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⑤

军史界有学者认为:如果说,陈云的《英勇的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的话,那么,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则是最早向世界报道长征的文章,比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一年以上报道红军长征。^⑥

由上可见,党史界、军史界认定陈云是最早真实报道红军的“第一人”,而不是别人。实际上,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人们认可的也是陈云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曾经将陈云文章和斯诺文章一并编辑成册出版(书名《长征两面写》)。编者指出:“这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资料,也是出人意料的‘特种游记’。”显而易见,编者对当时范长江写的红军长征报道并不看好。

范长江曾经报道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服装褴褛,有如乞丐”。这种描写,可能有违真实。据《陈云传》介绍,陈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需要纠正一件事,就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中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穿着破烂衣衫的中国红军战士。陈云说:“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

①②③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第175页、182页、184页、18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9~190页。

⑥ 陈宇《谁最早口述长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页、63页。

穿着要比画上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池。”^①照陈云的逻辑,范长江的报道立场是站在敌人一边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又一个问题,当时范长江的世界观确实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

其实,对那种“范长江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说法,只需轻轻点出一个事实,便足以将其击倒。这个事实是,当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是根据国民党统治区报纸提供的消息而作出的选择。那么,这条消息报道是不是范长江写的?肯定不是!如果不是,这条消息算不算比范长江还早报道红军长征?如果不是“如实”,中央红军又怎么会选择陕北,且又被证明了是正确的选择?可见,有的学术问题的真伪辨别,不在于长篇大论或鸿章巨制,而在于只需拿出一条铁的事实就足够证明了。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有的所谓“研究者”不愿花工夫,不肯做哪怕是不费劲的举手之劳,去翻翻当年的旧报。假如真的做了,只要稍为留心 and 略加留意,就会发现当年国民党政权作为胜利者是多么得意洋洋地报道红军战略转移的消息的。这些报道及其评论都比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要早得多。只要稍许保持学术良知,是不难作出公正客观的判断的。至于“公开报道”一说,更是语病尽显。凡是报道的,肯定都是公开的;凡是不公开的,肯定是没有报道的。试问:难道还有报道是不公开的吗?我们讨论问题,总得考虑起码的逻辑常识吧!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故意视而不见,对起码的逻辑常识都装作无知愚昧,那还配做学问吗?那还能做出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吗?

有的论者“聪明”地看出了范长江说法的破绽,便提出一种“新”解释,说范长江当年是“研究红军动向”,而有意模糊了范长江“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这句话中的关键词“北上以后”。虽然这种新解释成功地抹去

了关键的时间概念,但又暴露了另一个更大的弱点:如果范长江真的关注红军命运和研究红军动向,那么,为何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到1935年7月到达四川西部的整整10个月中,却不见范长江写出一个字的红军动向报道?范长江10个月后又突然关注红军动向的原因在哪里?范长江为何不从江西瑞金起步,一路追随红军西征路线采访,那不正是全国人民关心的热点吗?范长江未能赶上好机会的理由在哪里?可见这种新解释反而让人觉得是越抹越黑,越整越乱,弄巧成拙,还不如没有好。

还有的论者更“智慧”,把范长江的西北行和塞上行,干脆烩成一锅煮,故意搅混事情真相,愚弄受众视听。但是,熟知范长江经历和尊重历史真实的研究者都很清楚地知道: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相隔,然而,《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却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譬如,同样是写红军长征,这两本书的语气、语感、语调就差距相当大。又如,同样是描写我党我军高层人物,这两本书反映出的立场、角度和亲近感,也是差距相当大。究其原因,一是范长江西北行时正处于思想立场的剧烈转型期,尚未最后定型;二是范长江在西北行中基本上没有接触到红军,而在塞上行中却是大量接触红军,实地采访红军;三是范长江在塞上行中,见到了一批我党高层人士,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使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自此彻底改变了对我党我军的认识,而所有这些,在西北行中,范长江是不可能也没有遇到的。所以,西北行和塞上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既不能把西北行的东西放到塞上行的语境中论述,也不能把塞上行的东西放在西北行的语境下理解。学术上使不得偷梁换柱,不然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正确判断。

从范长江的个人境遇看,西北行和塞上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况。西北采访时,范长江还只是《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为了获得正式记者的岗位,他必须自觉以《大公报》的口径为自己的报道口径,不敢有丝毫懈怠。须知,此刻已年满26岁的范长江还未找到正式职业呀,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第192页。

一定很着急的。而在塞上采访时,范长江已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他的报道更加稳定成熟,写作风格更加老到坚实,终究解决了职业稳定的人生大问题,他的事业发展开始了质的飞跃。成名后的范长江肯定比成名前或未成名的范长江,在各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空间。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范长江的塞上行,是他人生经历的重大拐点。没有塞上行,范长江很可能在思想立场的道路上还会迷茫几年。正如范长江夫人沈谱先生在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塞上行》的“序言”中所写的:“西安事变是当时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在此期间,长江只身去西安、延安采访,最终导致了他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转变——从一个正直爱国的新闻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共产党员。社会的沿革,人生的崎岖,正可以用‘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名言来描述。长江生前就很喜欢谈论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从事范长江研究这么多年,我发现沈谱先生才是最了解和真正了解范长江的人,她给《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写的序言,可谓字字如金,对范长江的思想立场道路历程,把握极其准确,判断极其到位,评价极其中肯。反倒让我纳闷的是,有的范长江研究者却几乎从来不引用范长江夫人的观点和看法,这究竟为什么呢?

还有一位熟悉范长江的重量级人物值得人们注意,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黎澍曾在20世纪40年代与范长江共事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在《人民日报》主政时与班子成员产生矛盾,又是黎澍作为胡乔木的联络员参与调研和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所以,黎澍对范长江是相当了解的。改革开放后,黎澍写了回忆文章《胡愈之、范长江和国际社》,发表在1987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第38辑上。黎澍在文章中提到了范长江的西北行和塞上行,他写道:

(范长江)三十年代中期任天津《大公报》记者,赴西北采访,发表的通讯不仅为读者讲解战争态势,兼及当地历史情况,依据采访所得,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举国震动。但是由于事出

非常,交通阻隔,真相不明。正在这时,长江改变装束,进入西安,首先从这里发出报告实地见闻的一系列电报和通讯。他报道了新闻,同时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西安事变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陕北。他又到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中的著名英雄人物,是第一个访问陕北并作了详细报道,宣传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中国记者。

以上表述可见,黎澍不愧是历史学家。他以史家特有的求实眼光,极有分寸地评价了范长江的西北行和塞上行。让人格外惊讶的是,黎澍没有从俗,既未提当时已抬得很高的所谓“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未提范长江西北采访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向”的说法。可以肯定地说,黎澍决不是疏忽。黎澍熟知内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范长江的西北报道“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仅此而已!而对范长江的塞上采访,则给予了应有的高度评价,说范长江是第一个访问陕北红区的中国记者。强调“中国记者”,黎澍的用意在于区别在范长江之前进入陕北红区的外国记者——斯诺。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黎澍的论述和范长江夫人沈谱先生的评价,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我想在这里呼吁:不要低估范长江当年的智慧和聪明,那是对范长江本人最大的不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发现有的评价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譬如,一会儿说范长江“有头脑、有作为、有远见、有勇气”,一会儿又说范长江“不够成熟”,前后一比较,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至于为何“不够成熟”,为何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却是没有答案的。又如,一会儿说范长江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红军、研究红军,冒着生命危险去报道红军,一会儿又说范长江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在为党报工作。那么,范长江冒着生命危险的目的又是什么?既然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红军、研究红军,范长江

为何在中央红军长征 10 个月后才迟迟从北平动身赴四川成都?范长江没有赶上报道的合理解释是什么?难道不是共产党员就可以胡乱报道红军吗?斯诺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为党报工作,而且还是外国人,他为何就能够很好地报道红军呢?可见,是不是党员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记者的思想立场倾向。

我曾经考证过,范长江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三师,其特点是党团员多、青年学生多,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不知晓国共两党的残酷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了:当时有些像范长江这样年纪的青年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而言,在那个严酷而恐怖的年代,选择跟共产党走的人,毕竟是少数。譬如,我曾经列举过的粟裕。你可以说范长江当时没有明确而坚定的信仰,但不等于他没有考虑和没有想法,承认他只是政治头脑较弱就可以了。不然的话,范长江用不着为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那段经历而“深深遗憾”了。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范长江曾于 1934 年春夏之交专程到江西南昌,通过关系阅读了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有关中共的文件,范长江说:“我曾非常用心地读那些小册子,前后一共读过一千六七百本。”^①范长江越看越觉得奇怪,越看越觉得当时进行的战争没有道德的基础。范长江在“文革”写的《我的自述》中这样总结:“总的说来,我的南昌之行,收获很大,问题也未完全解决,事情也未完全弄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民党已腐化堕落,共产党在认真革命,但在当时情况下,要抗日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没有其它出路。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我还看不出门路,我准备继续研究共产党和红军的对策,把那些还不明白的东西搞清楚,我怀着这种想法回到北平。”^②依我之见,范长江 1934 年夏去南昌,还是因为他心中一直存有 1927 年的南昌情结。一是可能他没有料到当初南昌起义残存部队以后闹得这样厉害,二是他想探讨共产党为何能折腾出一片天地,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不是和我 1927 年以来所听到的不符合吗?”^③

回到北大的范长江似乎并没有“继续研究共产党和红军的对策”,而是将兴趣转向了学术。他在 1934 年底说道:“记者近来发了一个宏愿,想把北大方面在学术上有相当建树的几个部门,分别作系统的介绍。”^④为此,范长江先后在《北平晨报》和《大公报》发表了《佛学在北大》、《顾颉刚与禹贡》、《北京大学地质系沿革及其成绩》等。范长江到南昌时,中央苏区红军已被紧紧包围,正秘密策划战略西移,范长江转向学术研究时,中央红军已开始艰苦卓绝的西征。对此,我们应该作何解释呢?

有的论者将范长江报道中直称红军而不称“匪”呼为“独树一帜”。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当时《国闻周报》于 1933 年刊登的《赤区土地问题》和 1934 年刊登的《赤区的合作社运动》、《中国赤区的商业政策》、《中国赤区的工业政策》、《中国赤区的财政政策》、《中国赤区的土地税》、《中国赤区的农业政策》等系列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理由是:首先,这些文章也没有称“匪区”而是称“赤区”;其次,这些文章比范长江介绍红军还要早一年多甚至两年以上。可问题是,这个“独树一帜”那个也是“独树一帜”;“独树一帜”还有意义吗?究竟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独树一帜”?

五

范长江走过的思想道路与中国新闻出版界另一位著名人士邹韬奋走过的思想道路,极为相似。

范长江曾经说过:“以韬奋同时代的先进人物相比较,他在政治上的觉悟是比较迟的。郭沫若同志在 1921 年已经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者’,并且‘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韬奋那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⑤韬奋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不看好共产党,甚至撰文攻击红军的军事行动。1930 年 5 月 4 日,他在《生活》“小言论”专栏中发表《好县长》一文,称“蹂躏湘鄂粤赣边境的朱毛匪患愈演愈烈,以赣省受祸为尤甚,最近攻陷该省信丰县,焚杀甚惨,该县县长吴兆丰竟以忠勇为民而至以身殉职,

①②③④⑤ 《范长江新闻文集》,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年,第 896 页、1113 页、1113 页、3 页、1078 页。

尤可惋惜”。同年8月24日,又在《生活》以“心水”笔名发表《病根》一文,惊呼红军攻占长沙是场“惨祸”。这两篇明显站在国民党立场攻击我党我军的文章,均未收入《韬奋全集》中,故有人调侃:“全集”不全。韬奋临终前曾对人说:“我的著作许多地方不成熟,如果能整理出版,请周恩来副主席或胡愈之先生帮我删削修改。”^①似乎邹韬奋本人也不愿意将那些政治内容“不成熟”的东西整理出版。然而,从研究邹韬奋的心路历程来看,后人不得不也不能不关注那些“不成熟”的作品。由此可见,范长江与邹韬奋的早期思想道路是何其相似!

与范长江一样,邹韬奋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逐渐觉悟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韬奋文集》序言《韬奋的思想的发展》是范长江撰写的。范长江这样写道:“在全国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抗日运动中,在颠沛流离之中,逐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逐步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范长江鲜明地指出:“韬奋的一生,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道路,是广大的有善良愿望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范长江还指出:“从韬奋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规律。这里有两个基本关键问题:一个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第二个是对工农群众和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态度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是走向革命?还是走向反革命?决定于对上述两大问题的态度,这是知识分子走向的分水岭。”^②读着这些文字,仿佛让人感到范长江既是在写邹韬奋,又是在写他自己。范长江最能理解邹韬奋,因而是最合适的邹韬奋道路的评价者。其实,范长江何尝不是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的典型?!范长江的道路何

尝不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楷模?!这两位中国新闻界的巨子虽然现实生活的道路不同,但思想道路却是惊人地相似。

1949年7月,在韬奋逝世5周年之际,周恩来同志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个评价,对范长江而言,不也是非常合适、非常贴切的吗?

六

真理越辩越明。

随着讨论的深入,对范长江早期思想研究实际上聚焦到一个根本问题上:敢不敢正视和承认范长江西北采访前后存在着思想弱点?并且,正是这一思想弱点决定了他在西北采访时对红军长征报道的负面影响。

在政治环境越来越开明的当下,我们完全用不着为尊者隐,为尊者讳。尽管实事求是,在中国是天下第一难的事情,但是,本着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勇敢地走下去。即使现在没有结果也没关系,让后人去检视争论各方的观点,让时间去考验争论各方的学术水平,相信历史老人永远会删除错误看法!

是不是正视和承认了范长江的弱点和不足,就会影响范长江的崇高呢?非也!不但不会,反而更会增强人们对范长江百折不挠地追求真理劲头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范长江的钦佩。缺点不等于污点,更不等于劣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改正了缺点,就是好同志、好榜样。任何人的人生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曲曲折折、弯弯绕绕充满在每个人的前进道路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没有人天生正确,也没有人永远正确。研究和分析历史人物的曲折道路,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人物,把握历史人物,进而正确了解历史人物,合理解释历史人物。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②} 韬奋纪念馆编《邹韬奋研究》第二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311~312页。